

匡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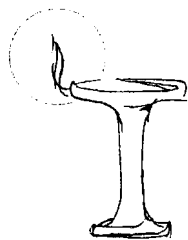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庄春波 著

汉武帝评传 (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汉武帝评传 (下)

庄春波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帝评传/庄春波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6012-0

I. 汉… II. 庄… III. 汉武帝(前156~前87)—评传
IV. 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2468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汉武帝评传

庄春波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8.5 字数 413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012-0

定价: 76.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任天石 巩本栋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七章 远征西域 再伐匈奴

发动远征西域,再伐匈奴的战争,是汉武帝刘彻晚年的重大战略决策。完成“封禅”之后,刘彻面临着选择:是株守已有的军事成就,就此转向和平轨道呢?还是继续对外用兵?这时正是历史的转折关头。刘彻选择了后者。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大一统”目标并未真正实现;二是张骞的地理发现为刘彻打开了一扇重新观察外部世界的窗口,使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特殊的浓厚兴趣;三是寻仙的方向转向了西方。总之,远征西域,再伐匈奴,除对付匈奴的直接军事目的外,还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文化、信仰方面的动因。

一、西域与早期沙漠草原“丝绸之路”

“西域”大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包括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西方更辽远的地域；狭义的西域则指以新疆为中心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人们的视野很容易受到自己视野的时间、空间观念的局限，与“夜郎自大”大同小异，汉代的人们“内华夏而外夷狄”，习惯于站在“中国”——“世界”的中央这样一个视角上，以“文化优位”的心态倨傲地看天下，看西域。那么，早在汉朝人认识西域之前，它是什么样子呢？

1. 先秦时期西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西域多山、干燥，属高原、草原、沙漠环境。从地缘关系看，广义西域是联结中国与西方的纽带，是东西方血缘—文化碰撞与交汇的“十字路口”，很早就有不同民族和多种文化交流。汉初黄老政治小国寡民眼光和格局，没有人考虑“西域”问题，故史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其实，先秦并非如此。从人类史角度看，每次生产力革命都会造成大规模人类种群迁徙。上古人类大迁徙处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外。公元前3000年后，文明发轫，东西方人种和文化交往在西域留下许多信息，并非“凿空”。

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是印欧民族的发源地。青铜文化初期（前2000年～公元前），广义西域人的“西方人种特征很明显”，人类学家称之为“原始欧洲人类



型”。其种系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甚至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区铜器时代人种相近。原始欧洲人以阿凡纳美沃文化(前3000年后期~前2000年初)和安德洛沃诺文化(前2000年~前1000年初)为代表,影响范围西起南乌拉尔山脉,东达叶尼塞河岸,北起西伯利亚森林南界,南抵中亚和新疆北部草原地区。“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向南,有两种时代稍晚的欧洲人种类型:一是帕米尔—费尔干类型(前2400~前1800年初),“与中亚地区同时代的塞克(Saka)和乌孙人的人类学类型基本相近或差别不大”;二是地中海东支类型,又称印度—阿富汗类型。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有发现(前2500年~前2000年)。^① 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民族迁徙浪潮中,古代欧洲人种进入狭义西域。这一过程对蒙古人种北方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利亚人种的分支,现代藏、彝、白、怒等民族的共同祖先古羌人进入西域稍晚(前1000~前500年),以分布于青海、新疆的卡约、寺洼、辛店、焉不拉克等遗址居民为代表。甘青一带的马家窑、齐家、马厂文化居民是其先驱。^② 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上半叶,狭义西域生活着三种人:一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二是伊朗—亚利安型,三是蒙古利亚古种的羌人型。

公元前1000年后半叶,广义西域的民族—文化板块发生剧烈碰撞。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国家危机,马其顿成为西

^①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赵丛苍 何利群《塔里木地区羌人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方最强大的国家。前 334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远征,先后侵入小亚细亚、埃及、两河流域。前 330 年灭亡波斯帝国,直抵锡尔河、阿姆河、印度河以西,东达葱岭,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利山大帝国。虽然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就分裂了,但其影响深远,史称“希腊化时代”。亚利山大帝国分裂出了塞琉西王国(条支);前 250 年,希腊人狄奥多特建立希腊化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控制了大夏(阿姆河以南)、粟特(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马尔其纳东部(今伊郎霍拉散省西北部)一带地域,公元前 2 世纪一度占领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它的北面,锡尔河以东是康居,新疆伊犁河流域则居住着乌孙人,这一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冲突、汇合的“十字路口”。

2. 早期“丝绸之路”

从公元前 1000 年后半叶开始,西方人已经陆续得到了关于“中国”的信息。古代波斯、印度、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 cinisten(支那,又译作脂那、至那、指那、震旦等)。约公元前 5 世纪古波斯文献称中国为 cini 或 Saini,后又称 cin 等;古印度乔底厘耶的《政事论》有 Cinapta(中国丝捆)一词,Cina 即中国;《摩诃波罗多》、《摩罗衍那》、《摩奴法典》都称中国为 Chinās;公元 1 世纪末古代拉丁文文献《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称中国为 Thin 或 Thinai;公元 2 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称中国为 Sinai。此外,古代希伯来、粟特、亚美尼亚、叙利亚、阿拉伯、佉卢文的文献中,都用相近的音称中国。17 至 20 世纪中外学者解释“支那”含义有:秦、日南、滇、羌、



荆(楚)、丝、绮。“cin 即秦”说比较合理。^①

秦人夙与西域人交往。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时,当地人仍称他为“秦人”。秦人“杂戎翟之俗”,中原各国“比于戎翟”^②。秦人“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商末,秦之一族“在西戎,保西垂”。周灭商(前11世纪中叶),秦祖蜚廉由西北边陲返回,得一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这些记载得到考古发现的有力佐证:“秦夷”、“秦人”与“华夷”在见于同器铭文。^③说明秦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确有根据。秦祖造父“以善御幸周繆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二十三年,“西戎杀秦仲”;周宣王与秦庄公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④。秦人较中原各国与西域有更直接的关系。从历史背景、语言传播、译文对音诸因素综合看,“cin 即秦”说的论据最充分。秦与西域有商贸交流,西域人以此解决生活之需,也向欧洲转贩来自中国的丝绸,形成了早期“丝绸之路”。

距今7000年前中国就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并制造出

① 意大利耶稣会士匡卫国(M. Martini)在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中首先提出。他仅将cin解释为秦朝。法国学者鲍梯(Pauthier)、伯希和(P. Prilliot)修正为包括秦国与统一后的秦朝。

②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③ 1963年陕西蓝田出土西周青铜器“询簋”,铭文有“秦夷”和“华夷”:“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且奠周邦。今余令汝啇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昆夷;师令侧,新口、华夷、口夷、口、人、成周走亚、口夷、秦人、降人、服夷……”见《记陕西蓝田县出土的西周铜簋》,《文物》,1966年第1期。

④ 《史记卷五·秦本纪》。



称为“踞织机”的纺织机械和形态逼真的蚕纹、蚕形饰物。商代已有“桑”、“蚕”、“丝”、“茧”等文字,并发现了纱纨(绢)、色帛、缣类、回纹绮、罗类织等物。^① 相当春秋代的新疆墓葬中出土物品有丝绸凤鸟纹刺绣。^② 前苏联阿尔泰斯克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物品中有凤凰图案的残绸。^③ 德国南部在公元前500年古墓尸体上发现有中国丝绸衣物残片。^④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也在享受着风靡古代世界的中国丝绸与文化。此外,在沿“丝绸之路”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中国制造的大量手工制品,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756件,玉料大都出自新疆。苏厉致赵惠文王信将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称为“三宝”。先秦中原的漆器、铜镜诸物在公元前5世纪中亚墓葬中发现。^⑤

公元前3世纪左右,西方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赛里斯”由古希腊语“赛尔”——“蚕”转衍而来。^⑥ 古希腊诗人阿里托芬的《吕西斯特刺忒》(前411年)提到用绢制成的上衣,称“Amorgiam”。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动物志》认为丝织品是用“大蛆”茧制成的。古代印度孔雀王朝旃罗陀笈多王(前320~前315年)的侍臣乔底厘耶著《政

① 高汉玉《桑蚕丝帛起源的探讨》,见黄盛章主编《亚洲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③ 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文物》,1991年第2期。

④ 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⑤ 《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⑥ 姚宝猷《中国丝专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7~38页。



事论》一书中有 Cinapatta 一词,意为“中国丝卷”^①。传给释迦牟尼丝绸迦纱的迦叶佛(相当于春秋晚期)说:“我初成道时,大梵天王施我彼丝,是化出,非是操茧。梵天王施经线坚牢,地神王施纬丝,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闻开著僧衣,即谓杀茧。汝若成道后,彼丝自出诸国,非是杀蚕,故我将付树神,今转付汝。”^②以丝绸文化为标志的中国物质文明早在先秦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以西的欧亚大陆广泛传播了。

由于秦据中国通向西域的门户之地,加之人们比较封闭的文化心态,中原很少得到关于西域的消息。尤其是一个世纪以来,匈奴人的迅速崛起以及对西域各国的严密防范和控制,使中西交通中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所以,至武帝朝之初,中原的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关于西域的消息。这才是汉代人们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的原因。

3. 元封前后汉帝国与匈奴冲突对西域的影响

汉儒的世界图式有点像同心圆:凡是天子征服之地,依照对天子的依附程度,分为“畿服”、“内服”、“外服”等层次:有“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或“九服”(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

刘彻“封禅”前后对汉帝国的疆域状况又有了新的构想——向南、向北价值已尽,海上的蓬莱寻找神仙也不了了之。

① 戴禾 张英莉《中国丝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西北古史地》,1986年第1期。

② 《遣释迦牟尼佛书付迦纱》,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释氏》。



刘彻认为,既然“天下一家”,外事四夷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是西域。他决定继续征伐匈奴,向西域方向推进。这当然是由汉—匈民族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引起的。汉与匈奴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直接对抗。元封以后,汉匈对抗的战略态势发生根本变化:匈奴王廷西迁至阿尔泰山一带后,对汉帝国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直接威胁少多了。但汉朝仍要常年保持对匈奴的防御,长城防线随匈奴王廷的西移而向西延伸,财政负担相当沉重。另外,西域各国各自为政,未能统一,面临匈奴直接军事威胁。匈奴通过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间的通道频频出入天山南北,把奴役和掠夺的主要矛头对向西域诸国。西域诸国面临两种选择,或臣服于匈奴以免入侵,或归附汉帝国寻求庇护。匈奴一贯野蛮地掠夺和奴役异族。匈奴取大月氏王头盖骨为饮器,大月氏惧而远徙中亚^①;“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②。被匈奴虏掠的人口大多要当奴隶,“贯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贯。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掠……其种非一”^③。

东汉末,匈奴使者责乌桓税,“乌桓距曰:奉(汉)天子召

① 月氏西迁年代诸说不一。据莫任南《关于月氏西迁年代问题》(《湖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在前169~前166年;西迁阿姆河在前162~前161年。此说可从。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③ 《后汉书·西域传》。



条,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倒悬之”^①。武帝朝后百余年,匈奴的国力败落之后尚且如此,则其强盛时对各国的压榨可想而知。其次,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帝国对丝绸之路的通商抱有相当大的期望,作了新的部署。但是,外交使团与商队,都需要军事力量的保护。元封前后,“是时,汉既灭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请吏。置牂柯、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岁十余辈,出此初郡,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物。于是汉发兵击昆明,斩首数万。后复遣使,竟不得通”^②。西南的自然、民族、地理条件复杂,不易通行,只好从西北方向想办法。但匈奴和西域诸国拦截汉商团屡有发生:“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③汉帝国与西方的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没有强大武力为后盾,国际贸易就没有保障。西域归来的汉使屡言西域诸国“兵弱易击”。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刘彻决心解决西域问题。

二、伐匈奴,征西域的决策过程

刘彻在世时就有人对征匈奴伐西域持有异义。在他身后,也有人指责说他重蹈“亡秦之迹”。刘彻对此似乎早有预见。他对弥留之际的卫青解释道:“朕不伐匈奴,天下不安。”

① 《三国志·魏志》注引《魏略》。

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③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



这算是对天下、对后人的交代。伐匈奴，征西域，既有刘彻直接负责的一面，也有形格势禁，势所必然的另一面。刘彻太初以后再启战端，伐大宛、征西域，不过是对匈奴战争的自然延伸。

1. 再伐匈奴——远征西域的序幕

远征西域的决策过程是伴随着刘彻的处理对匈奴关系的实践—认识过程展开的，在远征西域的全部过程展开之前，还有一段序幕。

自汉军大破匈奴后，匈奴王廷西移至近阿尔泰山一带。河西走廊一带形成“真空”地带。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武威后置）、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西域与汉帝国的关系是随汉帝国与匈奴攻守态势的转换而变化的，由于匈奴向西北迁徙，汉与西域各国关系的格局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匈奴与羌人联合的态势严重起来，威胁着汉帝国的西部和河西走廊的安全。刘彻一度想招回原来曾居住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或乌孙回来，但未能成功。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切断匈奴与羌人联盟，元鼎六年（前 111 年），刘彻派李息、徐自为率军十万平定西羌，置护羌校尉领护。此后相继平定南越、朝鲜。又遣公孙贺率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里，至浮沮井而还；赵破奴率万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目的是驱逐匈奴，使其不得阻隔汉使西域的使团。但汉军未见匈奴一人。于是汉分酒泉郡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匈奴传》载：



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乌孙北)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

可见,远征西域的决策是在汉匈军事力量对比,汉帝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作出的。

2. 和平外交政策屡屡受挫

刘彻曾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汉匈关系。他并不愿意一直打下去。但因匈奴立场顽固不化,坚持与汉帝国为敌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诉诸武力。

匈奴遭到惨重失败后,向汉朝求和。但匈奴不可能与汉帝国形成长期睦邻关系,这是由农耕与游牧不同生存方式和汉与匈奴长期民族冲突决定的,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当年霍去病曾说:“匈奴不灭,无以为家!”就看到了这一点。可见,远征匈奴并不是仅以刘彻个人的意愿为转移,而是欲罢不能的事情。匈奴自卫、霍“度幕”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自汉军大胜匈奴之后,北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匈奴一改往日的骄横,于元封四年(前106年)卑辞求和。

“和亲”与“入太子为质”是古代外交的两种礼遇。和亲从形式上看近于对等关系;入太子为质则等于臣服,二者有所不同。元封元年(前110年),刘彻亲自统率汉军十八万骑北巡之际,曾派遣郭吉持节出使匈奴。郭吉明确地向乌维单于转达了刘彻表示同意汉匈和解的意向: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焉？^①

这番话态度强硬，要匈奴“南面臣于汉”，建立君一臣关系的格局。乌维单于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出于实际利益考虑，对此都无法接受：

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贝加尔湖）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②

从乌维对汉帝国的外交姿态看，似乎是主动要求与汉帝国建立对等的和平伙伴关系。若果真能如此，则可以理解为乌维试图争取在匈奴与汉帝国交往中保持民族尊严的态度和立场。但是，事后事态的发展却一再证明并非如此：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③

黥面是奴隶的标志，在外交上是严重污辱。王乌甘于这样作，表示了刘彻和谈的诚意。“单于爱之，阳（佯）许曰：吾为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汉又派杨信为正式使节与匈

①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奴和谈,再度转达了刘彻的立场:

(单于)欲招入,不肯去节,乃坐穹庐外见杨信。
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
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繒絮食物
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反
悔故约),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稽)矣!”^①

乌维反悔了先前承诺的条件,欲恢复汉匈战争前汉对匈奴的屈辱条约!这充分暴露了乌维反复无常,毫无诚意。谈判的拉锯战再三反复,匈奴以此拖延时间,暗中备战。果然不久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扣留汉使路充国。刘彻只得沿边部署防御:发郭昌为拔胡将军,赵破奴屯兵朔方郡。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死,其子乌师庐立^②,号“儿单于”。刘彻派使节吊唁,“欲以乖其国”。即以单于甫立为楔机,软化匈奴与汉对立的立场。但终无济于事。儿单于当即扣留汉使。他知道,汉帝国绝不会对此善罢甘休,但即使远迁大漠以北,也不肯妥协,他认为,匈奴帝国只要稍事喘息,恢复元气,还能卷土重来。“自是后,单于益西北”^③。事已至此,刘彻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匈奴“百约百叛”,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汉对匈奴绥靖政策以失败告终。刘彻曾作过多次外交努力和适度的让步,但匈奴百般拖延虚于逶迤,多次扣留汉使者,毫无与汉和

①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② 乌维之子《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为乌师庐;《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为詹师庐。

